

人文精神与 意义探寻

主编 陆士桢 孟登迎

*Spirit of Humanity and
Exploration of its Meanings*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中国藏学出版社

人文精神与意义探寻

Spirit of Humanity and
Exploration of its Meanings

主编 陆士桢 孟登迎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中国藏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人文精神与意义探寻 / 陆士桢等主编. —北京: 中国藏学出版社, 2005. 8
ISBN 7-80057-793-7

I. 人… II. 陆… III. 人文科学 - 研究 IV. C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00726 号

特约编辑 李建军
责任编辑 薛 波
责任校对 吴 人
封面设计 王 华
版式设计 王炳图

出版发行	中国藏学出版社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0 (邮购)	010—64031534 (总编室)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新魏印刷厂	装 订 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05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 × 1092 毫米 1/16	
印 张	15.75	插 页 2
字 数	246 千字	
定 价	29.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编辑委员会

编委会主任 陆士桢

编委会副主任 李家华

编委会成员 吴鲁平 郝瑞庭 李秀峰 孟登迎

陆玉林 陈 涛 林 维 田春生

展 江

序

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 周 强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院长

今年是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成立 20 周年。20 年来，中青院作为共青团中央直属的高等学校，积极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培养了一批又一批政治素质较高、专业基础扎实、实践能力强的青年人才。同时，中青院充分发挥自身优势，把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把教学与科研相结合，形成了许多有特色、有深度的研究成果，即将集结出版的《社会转型中的青年发展与社会整合》、《构建和谐社会与政治文明建设》、《人文精神与意义探寻》三部文集，就是这些成果的集中展示。

青年理论研究是青年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为青年工作的决策和发展提供重要依据。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青年工作面临着许多亟待研究和解决的重大课题。比如，在“四个多样化”的新形势下，青年选择、青年群体结构、青年需求呈现多样化的趋势，如何适应青年这些变化，促进青年发展。比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资源配置方式与整合机制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单纯依靠行政命令等传统的动员方式难以实现有效的社会动员，如何构建青年的社会动员机制，以提高团组织的动员力和战斗力。又比如，当今时代是信息时代，互联网的迅猛发展对青年的思想和行为方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如何创新青年工作方式，充分运用网络电台、BBS、短信等新的手段加强青年思想政治工作，服务青年成长成才，等等。这一系列的新情况新问题，都需要我们加以思考和研究，推动青年工作向更高水平发展。

应该看到，近年来，我们在青年研究工作方面取得了许多成绩，中青

院在这方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面对时代的发展和青年的要求，我们的研究工作还要不断地深入，不断地创新，尤其是要紧紧把握时代发展的脉搏，及时跟踪青年的变化，全面了解青年工作的现状和发展趋势，扎扎实实地加强青年和青年工作研究，努力使我们的工作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增强预见性，为开展青年工作提供更好的指导，共同开创我国青年工作的新局面。

前言 人文精神与意义探寻

自1990年代开始,“人文精神”成了大陆学界关注的话题。《上海文学》1993年第6期发表的一篇对话体文章——《旷野上的废墟——文学和人文精神的危机》,一般被认为是这场讨论的开端。这篇对话是在华东师大中文系教授王晓明和几位青年学者之间展开的,他们从文学面临的危机谈起,最终宣告当代中国面临整体性的人文精神危机。这场原本在学人之间进行的自发的、随意的讨论,不想却引发了连锁效应。从1993年到1995年的两年间,全国各地不断有学者加入这场讨论。一时间,各地纷纷召开关于人文精神的学术讨论会,各大报刊也纷纷开设专栏和笔会。据王晓明先生的初步统计,到1995年8月,有关人文精神讨论的文章已超过100篇。^①

自此以后,“人文精神”逐渐成为一个流行语,频繁出现在各种文化和教育(甚至商业和行政管理)的口号当中。

这场持续两年之久的大讨论,随着来自不同学科和行业的讨论者的不断增多,涉及的范围越来越广泛,牵涉的问题也越来越复杂。与1980年代发生的多次文化思想论争截然不同,这次人文精神讨论没有形成为大家一致认同的结论,相反却凸显出讨论者在思想、学术、政治、乃至道德层面上存在的深刻的差异和分歧。实际上,这场有关人文精神的讨论并不是空穴来风,从一定意义上讲,它是1980年代精英知识分子启蒙话语的延续。新时期较宽松的思想空间,经济社会领域发生的重大变革,促成了知识分子日益强烈的启蒙意识,同时也促进了知识分子对于自身使命和角色的自觉。诚如王晓明所言,尽管这场讨论已经过去10年了,但由于其中

^① 见王晓明选编:《人文精神寻思录》“编后记”,文汇出版社1996年版。

所凸显的观念分歧直接促成了当今中国知识界和学术界对于一些根本问题的多元观点，所以它“依然是我们现实生活的一部分”。^①

当时所讨论的主要问题以及近年来人们对这些问题的进一步探究，基本上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1）“人文精神”这一概念应该如何来界定？（2）怎样估价当代中国出现的人文精神危机？（3）中国是否有人文精神的传统或者说中国式的人文价值体现在哪些方面？（4）人文精神的失落与人文知识分子的角色转变有何关系？（5）如何理解人文精神、人文学科、知识分子与人文教育的相关性，并在此基础上努力建构人文精神？

对于以上这些问题，尽管我们至今也给不出真正令人满意的答案（这些问题本身就具有历史变动性），但有关人文精神的诸多思考，已经成为我们讨论文化问题的基本语境，并且，10多年来这些思考分明已经渗透到了人文和社会科学研究的诸多领域。因此，我们认为应当以宽泛的定义来理解人文精神，而不要将它限于单一的学科领域，这样才比较接近人文精神讨论的真正用意。本书收录的这些文章，都直接或间接地讨论到人文精神、人文学科、人文关怀、人文理念、人文教育以及知识分子角色等诸多问题，从不同学科领域丰富了我们对于人文精神的理解。

一 关于“人文精神”的界定

“人文精神”这一提法从一开始就面临定义的困难。在现代汉语学术的语境当中，“人文”和“精神”这两个词严格说来都受到了翻译语言的影响，两者连缀成一个概念更增加了界定的难度。仅从字面上看，尽管“人文”一词可以溯源到《周易》“贲卦”的彖辞（“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但现代汉语中的“人文”概念早已失去了古代天、地、人三才论的哲学内涵，因此无法包容古代“人文”观所蕴含的丰富含义：君子立于天地之间、汲取天地精华灵秀、将自己培养成有内美之德并以非暴力教化天下黎民。朱维铮认为，自胡适1933年开始用“人文主义”翻译 Humanism 以来，我们提到的

^① 王晓明：“人文精神讨论十年祭——在上海交通大学的演讲”，见“世纪中国”网（<http://www.cc.org.cn/newcc/browwenzhang.php?articleid=2681>）

“人文”概念均接近 Humanism 的内涵。^①

但是, Humanism 在现代汉语中又有“人文主义”和“人道主义”两种译法;前一种强调文艺复兴时期人文学者的思想,后一种强调文艺复兴时期思想所具有的超时代的道德意义(见赖辉亮“关于‘Humanism’的两种解释及其翻译”)。另外,董乐山又考证出 Humanism 源于德文 Humanismus,而该德文词是德国教育家在 1808 年根据拉丁词根 Humanus 杜撰出来的。而 15 世纪末,意大利的学生把他们所学的古典语言和文学、法律等课程合称 studia humanitatis,意指人性修养,英译 the humanities 就来源于此。这就出现了用“人文主义”和“人文学科”来翻译 Humanismus 和 the humanities 的情况。^②

实际上,这也再次证明了“人文主义”这一范畴的复杂性。因此,笼统用人文主义或人道主义来说明中国学界所说的人文精神是不合适的。

那么,“人文精神”到底指什么呢?讨论发起人之一张汝伦认为,很难找到一个恰当的西语词来对应这 4 个字。Humanismus 和 Humanity 都无法解释“人文精神”,它比 Humanismus 更宽泛、更灵活,是一个“内涵稳定,外延模糊,蕴涵极为深广的概念”,强调人文二字主要为了与自然对举,“人文精神始终应该是自觉脱离了自然状态的人的一种生存状态或理想目标”。^③

王晓明等人最初在对话中是将人文精神限定在“信仰、信念、世界意义、人生价值这些精神追求”当中的。^④

张汝伦、陈思和、王晓明、朱学勤都强调人文精神既是普遍主义的,同时在实践中却必须是个体主义的。^⑤

袁进则认为,人文精神更多属于形而上的人的终极关怀,是人类的价值理性而不是工具理性。^⑥

① 朱维铮:何谓“人文精神”,《探索与争鸣》1994 年第 10 期。

② 见董乐山译,阿伦·布洛克著:《西方人文主义传统》“译序”,三联书店 1997 年版。

③ 张汝伦、林晖:“关于人文精神”,《文论报》,1995 年 1 月 15 日。

④ 王晓明、张宏、徐麟、张柠、崔宜明:“旷野上的废墟——文学与传统精神的危机”,《上海文学》1993 年第 6 期。

⑤ 张汝伦、王晓明、朱学勤、陈思和:“人文精神:是否可能与如何可能”,《读书》1994 年第 3 期。

⑥ 高瑞泉、袁进、张汝伦、李天纲:“人文精神寻踪”,《读书》1994 年第 4 期。

从这些学者对人文精神的界定尝试中可以看出,当前中国语境中的“人文精神”一词有着非常宽泛的意义指向和目标,并不是一个严密的哲学概念。它不仅限于人文学科当中,而是一种渗透于各学科之内,萦绕于各门学科(包括纯粹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和社会交际当中的精神价值。人文精神可以泛指人们在各种认识和实践活动中体现出的对人类生存意义和价值的关注,是一种以人为对象、以人为中心的价值追求。它是人内心深处的一种精神动力,能驱使人们去追求高尚的人生境界、自由奔放的情感和富于想象力的多姿多彩的生活。它是某种在使人之所以为“人”的一切活动中所折射出来的精神气质,这种精神气质包容了科学精神、艺术精神和道德精神以及所有能给予人文关怀的思想。

二 人文精神与人文学科

尽管我们认为人文精神是不限于某一学科的一种广泛存在的精神气质,但“人文精神”能成为一个受人关注的话题,却更多与人文学科在现代的艰难处境和人文知识分子面对现代社会的焦虑有直接关系。

华勒斯坦等学者指出,当前在社会科学领域占主导地位的现代学科体系实际上起始自19世纪。学科并不是我们今日所见到的静态知识分类,而是一种历史化的产物,是以一定的措辞建构起来的。学科首先是一些经过分类的知识,这种分类方法同时成了这门学科的规范和要求,因此,学科代表了知识和权力两个方面。现代意义上的学科分化,则是随着社会分工的日渐细致而逐渐深化的,这一过程最早出现在近代的西方。若再作进一步考察,会发现社会科学的这种分类实际起因于17、18世纪的自然科学分化,到18世纪末自然哲学断裂为各门独立的自然科学(物理、化学和生物);而社会科学稍后又从道德哲学中分裂出来。正是从这时起,现代意义上的诸种学科才正式诞生。由于从19世纪起形成了人文学科自然科学化的潮流,人文学科(如文学、语言、历史和哲学等)与科学出现了严重分裂,到了20世纪“人文学科”这一名称才成为对那些被排拒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外的学科的简便总称,同时它本身也是由科学界定的。现代哲学是由科学形成时清除出来的东西界定的,其他现代人文学科

则首先以古典语文学的形式出现，其后衍生出历史、现代语言和艺术。^①

这意味着，自从人类开始反思自然科学和工具理性的局限性开始，大多数哲学家和教育家都认识到，不能用简单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二分法来对知识进行范围分割，因为还存在一门无法用“科学”方法囊括的学科（discipline，注意：不是科学！）：人文学科。美国大学中的文理学院，通常将学科专业分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三大群落，就是从如上所述的学科分化史而来的。这些大学中的自然科学分院通常设有物理学、化学、天文学、数学等系，社会科学分院通常设有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系，人文学分院通常设有语言学、文学、艺术史、哲学、历史学等系。此外像法学、管理学、教育学这些本属社会科学的学科因特殊原因则通常设立为专门的学院（参看肖峰“社会科学：科学还是人文”）。如果再作进一步分析，就会发现现代知识分类和学科体制经历的分化过程，与现代社会对于科学以及社会生产力的功利要求有着直接的关系。由于科学的分化有利于提高社会生产力，科学在现代社会基本上已经变成了利润的手段，科学主义也就成为占主导地位的学科意识形态。以自然科学为样板对社会科学进行划分、对人文学科进行规训，实际上导致了科学主义、欧洲中心主义、父权主义和国家中心主义等意识形态的产生，并使得这些不乏霸权色彩的意识形态对人文学科产生了致命的威胁。

面对自然科学分化带来的这种日益增强和扩散的学科规训制度，在科学主义和功利气息弥漫的现代社会，文学艺术、存在哲学和宗教为了维护自己的生存，经常以跟科学对立的姿态来划定自身的边界。人文学科与科学主义的关系日益紧张，人文学科自身的特性也在抵抗科学主义的过程中展现得更为突出。对于文学艺术、哲学、宗教和伦理学等学科来说，许多思想只能通过个体的情感体悟或道德实践才能被理解和传达。因此，它们不需要获得一种绝对正确的解释，而需要各个时代、各个国度的各位身份不同的读者在一种宽容的环境中进行深入地体味、思考、交流和对话。人文学科反对将人当作一个客观的冷冰冰的科学研究对象，而希望直接沟通人际之间的内心需求，促进人性的全面健康发展。从这一点来说，人文学

① 刘健芝等编译、华勒斯坦（I. Wallerstein）等著《学科·知识·权力》，三联书店·牛津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6页。

科是集中体现“人文精神”的特殊学术领域，它更容易促成人际之间对精神价值的相互理解和开放。本书后半部分有多篇探讨历史与文艺中的人文精神的文章，它们或勾画历史人物的铮铮铁骨，或体味文艺形象的精神魂魄，或剖析作家的人格和心理，或探询一个社会或一群人的信仰和追求，都充分展现出人文学科所特有的人文魅力。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人文精神只为人文学科所独有，由于人文精神是一种价值性内涵，它不限于任何一门具体的学科领域，因此，包括自然科学在内的科学研究过程同样也具有人文精神。爱因斯坦曾说，“科学的发展，以及一般的创造性精神活动的发展，还需要另一种自由，这可以称为内心的自由。这种精神上的自由在于思想上不受权威和社会偏见的束缚，也不受一般违背哲理的常规和习惯的束缚。这种内心的自由是大自然难得赋予的一种礼物，也是值得个人追求的一个目标。”^①

在这里，内心的自由感不仅是科学发现的条件，而且是人生追求的目标，是审美的想象。科学工作同样能够赐予我们自由感和创造力，这分明也是一种非常难得的人文精神。

实际上，正如肖峰所指出的，要想在科学与人文之间划出一条非常清晰的界线，是很困难的。他在“科学与人文划界的确定性和不确定性”一文中指出，科学和人文是既有区别也有联系的两种文化现象，从研究对象、表达手段、认识成果的公认度和对认识结论的判别手段上，可以在科学与人文之间划出确定的界限；同时，从这几个方面也可以看到科学与人文之间的互相过渡，尤其是某些知识领域呈现出亦此亦彼的特点，使得科学与人文之间的界限又具有了不确定性。这种双重特性体现出科学与人文之间关系的丰富内涵，使得两者具有各自不同特点及相对的独立性，另一方面又是相互交叉、可以融合的。他还在“从科学走向人文：三种模式的比较”中具体讨论了人类历史上从科学走向人文的三种有代表性的模式——“苏格拉底式”、“帕斯卡尔式”和“爱因斯坦式”，揭示出科学与人文的历史联系及科学与人文会通的前景和意义。作者认为这三种模式不仅具有个人的意义，还具有时代的象征意义。苏格拉底的转向意味着人

① 爱因斯坦著，许良英等编译：《爱因斯坦文集》第3卷，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179-180页。

类在探索世界的历程中人文重心的开创，帕斯卡尔从科学走向人文的转向意味对萌芽中的科学主义的反叛，而爱因斯坦从科学到人文的走向则是在科学与人文冲突时代完成的，它预示着科学与人文和谐融通的时代正在到来（《方法》1999年第3期）。

在这些分析中，我们要强调的是，虽然我们认为人文学科是集中体现人文精神的学术领域，但我们又不至于在人文学科领域讨论人文精神，而是努力揭示包括科学和社会实践领域所潜藏的精神力量。

三 人文精神与知识分子

人们不难发现，发起和参与人文精神讨论的学者，基本上都来自人文学科领域，他们一般都被称为人文知识分子。这一现象的出现既与我们在前面讨论的人文学科在现代社会处境有关，也与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群体的迅速分化相关。正如陆玉林在“论知识分子和人文理念的建构”中所指出的，高度专业化的现代社会加剧了知识分子的专业化趋势，每一位学者首先都得成为社会生产体制中的专业劳动者。而过度专业化的知识分子，由于更多关注技术层面的问题，已经逐渐丧失了关注带有普遍性的人文理念的兴趣和能力。每一位经历过20世纪80年代“文化热”、“美学热”和“经商下海热”，经历过20世纪90年代初的迅猛商业化浪潮的人，都能真切地感受到中国知识分子群体发生的深刻分化。

1970年代晚期开始的思想解放运动，极大地激发了知识分子探讨社会和人生问题的热情。1980年代盛极一时的“文化热”和“美学热”，其实主要关注的是如何改造国民性、寻找个体的生命价值以及中国应该走何种改革道路这些非常宏大的问题。绝大多数人文知识分子（包括大部分自然科学学者）都取得相对一致的认识，即中国必须快速推进现代化的民主改革，并认定这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是历史发展的方向。但在经历了国际、国内诸多重大历史事件的震荡之后，尤其是1992年以来的新的经济改革浪潮冲击以后，中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剧烈的改变。正是在这个时候，人文知识分子1980年代的那种乐观和自信迅速崩溃了，并陷入了空前的思想困惑当中，他们突然发现自己原来对于社会和自身的种种确信其实都是幻觉，开始怀疑自己所从事的学术工作，从而出现了身份认

同危机。^① 随着全球化的加剧,这种身份认同的危机表现得日益明显,中国知识界进入21世纪以来对于国内国际重大事件的截然不同的反应就是生动的体现。

实际上,身份认同危机并不单单是中国人文知识分子所面临的难题,世界各国的知识分子都遇到过类似的处境。如果我们考察“知识分子”这一范畴的历史,就会发现知识分子与人文精神有着天然的联系。

知识分子(intelligentsia)这一概念从词源上讲有俄国和法国两个源头。它最早源于俄文(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出现在19世纪的俄国。尽管当时的俄国社会并没有西欧那样发达的市民社会,却有一批批判专制制度的“逆子贰臣”,他们因为接受了现代民主思想,产生了一种批判现行秩序的强烈意识。这批与主流社会有着疏离感、充满强烈批判精神、尤其是道德批判意识的群体,并不是一个职业的阶层,而是在精神气质上有着共通之处的精神性的群体,在当时被称为知识分子。正如雷永生所指出的,俄罗斯的知识分子“在精神上不是生活在现在,而是生活在未来,有时则生活在过去。当然,这里的过去也被他们想象成未来”(参见雷永生“剖析俄罗斯之魂——别尔嘉耶夫的俄罗斯文化研究”)。别尔嘉耶夫对于以托尔斯泰、陀斯妥耶夫斯基、赫尔岑、别林斯基等为代表的俄罗斯知识分子群体的分析,充分展现了俄国知识分子的崇高献身精神和理想主义色彩。

知识分子(intellectual)概念的另一个来源出现在19世纪末的法国。1894年法国发生著名的德雷福斯事件。德雷福斯上尉由于其犹太人的血统而遭受诬陷,蒙冤达12年之久。这引起了一批具有正义感与社会良知的知识人士(包括左拉、法朗士等)的义愤,他们纷纷站出来为德雷福斯辩护,“知识分子”(intellectual)这个词就是在德雷福斯事件中创造出来的。1898年1月13日,克雷蒙梭在他主编的《震旦报》(L'Aurore)上,将左拉致共和国总统的公开信冠以《我控诉!》这样的挑战性标题发表,从而造成了全国性的影响。第二天这件事就引起了一场抗议签名活动,签名者基本上由大学里的师生或持有高等教育文凭的学者组成,还有

① 参考王晓明:“人文精神讨论十年祭——在上海交通大学的演讲”,见“世纪中国”网(<http://www.cc.org.cn/newcc/browwenzhang.php?articleid=2681>)

作家与艺术家，以及一些自由职业者，如建筑师、律师、医生等等。10天后，即1月23日，克雷蒙梭有感于参与者的增多，发表了一篇标题为《知识分子宣言》的文章。由于这群游离在社会边缘的各类知识分子开始作为一股新的政治力量在法国政坛产生影响，他们的敌对者就把这批为社会正义辩护、批判社会不公的人士蔑视地称之为“知识分子”。

从中可以看出，尽管“知识分子”在俄国是具有英雄主义的悲壮色彩，而在法国则更多地显现为公共自由职业者的正义形象，但他们也有一些共同的地方。以俄国民主主义者和左拉为代表，在欧洲出现的是一群以独立身份、借助知识和精神的力量，敢于为社会伸张正义，勇于批判社会不公的新的政治阶层。而且，他们都是在现代社会已经备受批判的19世纪开始出现的，因此，他们身上所具有的这种批判气质和高尚精神还残留着人文知识分子曾经拥有过的精英情怀。在米歇尔·福柯看来，具有这种宏大人文关怀的知识分子“脱胎于法理学家或知名人士，然后在作家身上找到最完整的表达方式，因为作家是价值和意义的承担者”。他们面向大众的日常价值和普遍意义发言，属于“普遍性知识分子”而不是“专家性的知识分子”。^① 这群人身上所体现的强烈的人文精神，至今还是人们所津津乐道和怀恋的宝贵精神资源。

但是，随着知识分子在近现代日益专业化，知识分子的传统职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具有普遍性人文关怀的知识分子已经被越来越职业化的“专业性知识分子”所替代。如今随处可见的是左右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和权力的“专家性知识分子”，比如各类专家、学者，尤其是一言九鼎的核专家，他们主要关注自己专业范围内的功用价值或意义。^② 英国社会学家齐格蒙·鲍曼用“立法者”和“阐释者”这两种隐喻来表达知识分子在现代社会与后现代社会的不同功能，认为传统的人文知识分子所享有的为世界“立法”的特权已经蜕变为只能对世界提供某种解释的权利。^③ 而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则从阶级论的角度更进一步分析了知识分子群体的处

① 参见福柯“‘专家性’知识分子”，《东西方文化评论》第三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

② 同上。

③ 参见齐格蒙·鲍曼著、洪涛译：《立法者与阐释者：论现代性、后现代性与知识分子》“导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境。他将知识分子看作是一批掌握了“文化资本”，因为拥有文化资本享有某种特权，但同时又深受更强大的权力和金钱集团所压迫的一个中间群体。他认为现代学科制度通过标准化、科层化的区分体系形成一种“专业态度”（professionalism），这种“专业态度”使知识分子将其注意力完全集中于狭隘的知识领域，甚至对普遍的社会矛盾和社会不公正现象变得日益漠不关心。现代学科体制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使知识分子逐渐丧失了自己的社会公共代言人角色，放弃了自己所应承担的社会批判责任，成了一群面目模糊的专业人士。美国著名批评家爱德华·W. 萨义德由此断言，这种所谓的“专业态度”是“对于今天知识分子的特别威胁”^①。

从这些分析可以看出，人们对于知识分子过度专业化所带来的负面后果的批判，实际上与人们对于人文精神和人文关怀的渴望是联系在一起的。尽管在日益工具化、专业化的现代社会分工当中，具有人文精神的知识分子的生存处境越来越艰难，但是，人文知识分子还依然承载着传统知识分子的某些社会职能，并没有放弃对社会正义和终极价值的追求。在关于人文精神的讨论中，不少论者认为知识分子应该具有自己的“岗位意识”，应该首先自我救赎，回到自己的精神家园中去，应该努力去建构“学统”，为学术和知识价值做一些扎扎实实的原始积累工作。在此基础上，通过知识分子自身的学术活动和方式来关注社会现实，重建人文精神。经过讨论，人们逐渐深化了对知识分子多重角色的认识，认为人文知识分子除了解救自我的精神危机之外，更应该在专业和公共两个方面对社会发挥积极影响。至此，知识分子的学术人格又成为学界讨论的焦点，陈寅恪、王国维、吴宓、顾准等人被重新塑造成人文英雄，这就传达出人文知识分子对于自身身份的深入反省和对理想人格的强烈期许。

四 人文精神的培育

10年前兴起的人文精神讨论，直接抨击的是人文精神在当代的匮乏、缺失和被遮蔽状态。而今10年过去了，情况又有多大的改观呢？值得庆幸的是，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了人文精神和人文学科的重要性，也开始耐

^① 爱德华·W. 萨义德著，单德兴译：《知识分子论》，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65页。

心地去研讨人文学科的特殊性，人们开始对知识分子的过度专业化持警惕的态度。

近10年来，首先是中学语文教育受到了空前猛烈的抨击，从名牌大学的文学教授、中学特级教师到普通的中小学生，纷纷愤然而起，激烈抨击当今的中学语文教育。大家普遍认为当今中学语文教育过于强调语言点的烦琐分析，轻视课文的人文性和欣赏性。这场讨论在1997年和1998年间达到了高潮，使得今天的中学语文教材终于有了很大的改观，高考作文命题也有了较大的变化。随着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深入，尤其是随着高校的扩招以及大学生出现的许多心理问题，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开始关注大学的人文教育和通识教育问题。近5年，以《大学人文》、《大学语文》、“名家通识讲座书系”为代表的众多大学人文教育教材纷纷出版，以人文教育为主题的各种讲座空前活跃，研究人文教育和通识教育的学术成果也大量问世。几乎所有的高校都通过增开人文类课程、举办各类人文讲座来强化人文教育，而且他们在管理体制上也做出了有益的探索。从1995年起，教育部在一些重点大学实施的“大文科基地”建设项目，以及北大清华等名校所进行的一些淡化专业、强化通识和文理兼修的教改尝试，都取得了比较大的成效。

但是，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高校的人文气氛和师生的人文精神状态还不尽如人意，大学生中出现的诸多心理问题和不健康的生活方式都与人文精神的匮乏有密切关系。近年来在大学生中出现的数起漠视或残害动植物和同类生命的恶性事件，都暴露出对于人性理解的狭隘和片面。另外，在当今人文学术和教育的管理体制当中，依然充斥着工具理性的暴力，充斥着简单化的数字管理对于人文精神的压抑和束缚。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陈丹青，武汉大学哲学系教授邓晓芒愤然辞去博导职务的勇敢反抗，让我们看到了优秀的人文学者对于工具理性和技术官僚体制的抗争日益强烈，这也从反面说明了束缚人文精神的工具化管理体制的强大。这种以数字指标为尚方宝剑的工具化的管理体制，却是以科学、公正的面目出现在人们眼前的，它是人文精神面临的巨大威胁。

因此，要想真正提升整个社会的人文精神，培育个体的人文情怀，还需要从认识上和实践上做出艰苦的努力。首先，应当矫正和完善大学人文教育理念，从理论上搞清人文学科的定位，搞清人文学科的特殊运